

波德莱尔与巴黎

南博职业技术学院 禹婷婷

[摘要]波德莱尔现代性的文学体验可以说与资本主义从19世纪中期以来对巴黎空间的改造密切相关。本文试图把波德莱尔放在法国及巴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探讨波德莱尔与巴黎的关系。

[关键词]波德莱尔 巴黎 都市 现代性

波德莱尔出生于1821年的巴黎。1830年,路易·菲利普开始统治法国,“自由和理想主义被取代,神权和皇权被地主、资本家的统治所取代,这是资产阶级专权的时期。法国迅速变成了商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1]到1850年,短短二十年时间,法国基本上从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镇和工业为主的社会,而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得人口大规模地涌向城市。1840年,巴黎人口从1800年的75万,增加了近两倍。^[2]而巴黎也悄然地更换了头面:不断拓宽的街道,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中世纪已俨然被现代取而代之。波德莱尔生活与创作的时间与这个时期休戚相关。换言之,巴黎的城市化进程赋予了他独特的视角,借助现代化眼光“创造了一种纯粹的巴黎的诗”。

从性格气质和个性特征而言,波德莱尔是叛逆且忧郁的,而波德莱尔的叛逆性格和忧郁气质是和他他在巴黎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这还要从其父母那段老夫少妻式的畸形婚姻说起。波德莱尔出世的时候,父亲比母亲大三十五岁。他在一八六四年写给朋友的信里说:“我是病态的,性情极恶劣,由于我父母的过错,因为他们,我糟蹋自己,这便是父亲六十二岁,母亲二十七岁所生儿子的结果。”波德莱尔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面貌,父亲就已老死家中。随之而来的母亲的改嫁,使得他敏感幼小的心灵又一次受到巨大的震撼,而继父欧比克在他幼小的心里也扎根滋长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可以说,对父母的埋怨,对继父的憎恨是导致其忧郁的最初症结所在。随着年事渐长,波德莱尔日益强烈地显露出独立不羁和桀骜不驯的性格,与继父更是针锋相对。1832年,继父被调往里昂,他也随之被送入里昂的一所寄宿学校。寄宿学校的生活已经使他感到烦闷,而破败的街道,肮脏的工厂,灰蒙蒙的天空又使他的“沉重的忧郁”越发地沉重。“沉重的忧郁”使他藐视习俗、挑战权威,终因叛逆的个性被继父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答。然而强烈的巴黎情结使得这次长途旅行也不过才持续了十八个月就宣告终结。岂知返回之后,他的反叛之心更甚,因为他的厌倦不再只限于家庭,他的反抗也不再只针对继父。如果说对资产阶级的厌恶最初起源于对继父的憎恨,那么透过他继父的封闭与自满,他看出了资产阶级的虚伪与丑恶,透过资产阶级的虚伪,他更质问生命存在本身。不过,他从来都不是什么革命派,虽然在1848年革命的街头激战时,人们也曾看到过他在临时搭建的防御物后挥动武器的身影,但是他并不理解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他只是扬言要枪毙了欧比克,只是要发泄对他继父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的仇恨和鄙夷。

1848年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无产阶级的失利使得很多人感到失望甚至幻灭。这其中就包括像波德莱尔这样的资产阶级文人。曾和他一起办报的夏尔杜班说:“波德莱尔爱革命,就像他爱一切暴力的、不正常的东西一样。”而吕孚则说:“波德莱尔爱的不是暴力和不正常本身,他爱的是反抗,因为这个世界,无论什么制度,他都不能容忍。”当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已然无可置疑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时,无产阶级的适时出现,使得资产阶级这种作为垄断意识形态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同时也为波德莱尔的反抗精神找到了出口。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波德莱尔的思想一直处于极度地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不得不看到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前途,一方面又感到在这个阶级中受到压抑,心中充满着愤懑,想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诗意地栖居”只能成为空谈,但若要让完全摒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彻底斩断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又不可能。于是他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排解的忧郁之中,这也成为波德莱尔忧郁的最本质的根源。如果说家庭的不幸造就了波德莱尔叛逆的性格特征,那么对资产阶级的无意义认同又无法摆脱则成全了他忧郁的精神气质。

波德莱尔的生活经历,处于边缘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独特的优郁气质,决定了他与社会、与城市的关系:固守个人的独立性,对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极度厌恶,面对资产阶级对思想的独霸,以浪荡悠闲的方式另辟蹊径,去探寻事实真相。

也就是说,面对资产阶级中心,作为边缘存在的诗人时时刻刻挑战“中心”的正统性与正当性。波德莱尔曾带着父亲留给他的十万金法郎,离开家庭,过起了挥金如土的浪荡生活。他要做一个浪荡子(le dandy)。“浪荡”一词,在他眼中意味着高贵、文雅、不尚流俗,既有着面对痛苦而不动声色的英雄气概,又有着忍受尘世的苦难而赎罪的宗教色彩,总之,浪荡一词意味着追求崇高”。^[3]他自己也说过:“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一直觉得是某种丑恶的东西。”^[4]他厌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于是,他整日呼朋引伴,野游滥饮,浸泡在胭脂水粉和酒精大麻里。这样地放浪形骸又一次引起了家人的不安,于是欧比克夫妇找来公证人替他管理财产,每月只给他可怜的两百法郎。从此,波德莱尔的浪荡生涯不再优雅,因为作为浪荡子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闲”。现在,为了维持浪荡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去干他一向最鄙薄的事情:靠笔杆子挣钱。诗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名声不足以保证其收益的文学建筑师”,“必须不论人家出什么价都卖”。“当作家/我出卖我的思想”成为街头一名“枵腹的卖艺者”,这样的诗句也不时地暴露出他身为边缘文人的自卑与无奈。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困顿交迫的巴黎体验,即现代社会中文人的典型命运——一种被资本主义市场文化所决定了的生存方式。

作为生活在城市的诗人而言,巴黎自然而然成为其排解忧郁和倾诉苦闷的对象。波德莱尔生于巴黎,长于巴黎,一生甚少离开巴黎,他对巴黎的感情是炽热且赤诚的,而诗人用来描绘巴黎的语言可以说是冷静甚至冷酷的。他拒绝把生活空虚的理想化,拒绝浮面的繁华与欢娱,他要返回到城市的最底下,以艺术家的身份去窥探真实的巴黎。如果巴黎是包孕了那么多的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那么,只有深入挖掘进去,看看究竟,尝个透彻,才可能真正读懂巴黎这座城市。

巴黎在诗人笔下成为一个语意混乱的象征,这个富人与流浪汉聚集的地方、物欲和色情的符号,无勾不起诗人强烈的窥视欲。在波德莱尔看来,“巴黎的生活在富有诗意和令人惊奇的题材方面是很丰富的”,巴黎为诗人提供了崭新的形象、性格和心理,它尤其提供了崭新的冲突和对比,使诗人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悠游徘徊,不禁感叹:“城市面貌,哎,比人心变得快!”城市辉煌的背景里充斥着“向着苍穹喷涂浓烟的工业的方尖碑,正在修建建筑物的神奇的手脚架”,城市弯曲的褶皱里徘徊着流浪汉、乞丐、小老太婆、妓女……他的诗集中渗透着对整个时代主流意识的批判,他所展现的也正是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恶果而非成就。辉煌的巴黎、宏伟的巴黎通过他的眼几乎变成了一个地狱般邪恶、梦魇的世界,一个破烂的世界;那才是他所探知到的巴黎的秘密。

参考文献

[1] Lechan Richard,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5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法]夏尔·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恶之花》第1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4]《我心裸露》,波德莱尔全集第一卷,第678页